

西方著名的戰略研究機構

譚 溯 澄

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戰略研究業已形成為國際政治學中相當重要的部份，而研究機構之設立亦如雨後春筍，紛紛在各國出現。過去，研究戰略問題大多屬於純武人之事，而在今天却與外交政策的分析，密相結合。我們若將戰後著名的戰略書籍加以統計，很容易便可發現絕大多數都是出諸於「文人戰略家」之手。觀國內對分析戰略實質問題的文章，每年所見已甚多；惟有關西方著名的戰略研究機構內部之介紹，則非常罕有。本文之作，乃希望有助於彌補此一學術研究之缺陷。當吾人瞭解了西方各著名的戰略研究機構特色後，便自然而然地會想起，在我國的未來，是否也應該有類似機構的成立呢？

一、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

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簡稱 I I S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一個戰略研究機構。它成立於一九五八年，至目前才剛超過二十歲不久，即已經有輝煌的成就，實在是一件不容易之事。它之所以稱為「國際的」(International)，是因為該所的審議會(Council)、工作人員(Staff)以及會員(Membership)都不全是由英國本國人擔任的。如「印度時報」(The Hindustan Times)的助理編輯包哥瓦(G. S. Bhargava)就曾擔任過倫敦戰略研究所的副研究員，從事於印度國防環境的研究工作。誠如前任該所主任布肯(Alastair Buchan)所說：

「世界工藝及政治之綜合發展，對於戰略思想具有革命性之影響，……由於核子武器與超音速投射工具之出現，才使戰略思想發生根本之改變；同時，也因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彼此間互限來往而產生了激烈的思想衝突。更因殖民主義的迅速崩潰，以及統一而奏效的革命戰爭戰略之急劇發展，使吾人必須付出更多的心力，從事於戰略的研究。在以往，未曾列入戰略研究範圍內的許多學科，如哲學、經濟、自然科學等，也都應該予以運用①。」

註① 布肯在他自己所編的《現代戰略問題》一書中所寫的序言。該書有中文譯本，譯者為謝秉忱，民國六十二年由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至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會再版。

這些話均表明了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的研究範圍，重點不在於純軍事的研究，而在於分析國際關係中的「對力量的管理與控制」。換言之，它是集中精力於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國防（International Defense）與軍備管制（Arms Control）三大方面。據統計，迄至一九七五年，已有超過五十餘國的國籍人員，曾參與該研究所的工作。每年一度的會員會議，是該所的盛典。它經常利用此一集會的難得時間，邀請世界知名的戰略學者，發表一系列的學術演講，藉以促進戰略學之向前發展。如法國巴黎大學社會學教授艾隆（Raymond Aron）、美國科羅拉多大學（University of Colorado）行爲科學研究所教授包汀（Kenneth E. Boulding）以及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布爾（Hedley Bull）和英國本國的倫敦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戰略研究教授霍華德（Michael Howard）等，都曾在年會中發表演講，霍華德教授尚且是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的創始人之一，其重要性可知^②。

倫敦戰略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不以長篇大論見稱，它的出版品很少有超過二百頁的，但它的影響力却波及到全世界。每年必出的「世界軍力平衡」（Military Balance）和「世界戰略年度鳥瞰」（Strategic Survey），已成爲各國研究戰略者人手一冊的基本書籍。美國的「空軍雜誌」（Air Force Magazine）已獲得倫敦戰略研究所的允許，將「世界軍力平衡」一書，在該刊之每年十二月號上，全部加以轉載。故一般讀者若不能直接向倫敦戰略研究所買到此書，也可以從「空軍雜誌」中知悉世界軍力之一般分佈情形。

「世界戰略年度鳥瞰」是一本以地理區域爲劃分原則的資料性讀物，有時也附帶討論到幾個比較重要的專題。如在一九七二年曾討論到未來戰略武器限制之趨勢，一九七五年曾討論到新海軍武器工藝等，就是其例子。以上所說的「世界軍力平衡」和「世界戰略年度鳥瞰」，可謂爲倫敦戰略研究所的年刊，至於定期出版的雙月刊，則爲「生存雙月刊」（Survival），每年六期，合爲一卷，現已出至第二十二卷。另外，該所還出版不定期的專刊，名爲「艾德費論叢」（Adelphi Papers），現已超過百種以上，其中有許多都是與亞洲有關的。像第九十五號論叢爲「日本安全與美國」（Japanese Secur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第九十九號論叢爲「核子武器與中共政策」（Nuclear Weapons and Chinese Policy）以及第一百零四號論叢爲「印尼之未來與東南亞」（Indonesia's Future and South-East Asia）等，都是可供戰略研究之良好參考資料^③。總括而言，倫敦

註② 霍華德教授是英國當今最知名的戰略研究家之一，著述甚豐，重要論文有「作爲政策工具之戰爭」（War as an instrument of policy）及「軍事力量與世界秩序」（Military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Order）等。前一文被收入由哈佛大學於一九六六年出版之「外交研究：國際政治理論名著叢編」（*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書中。後一文被收入紐約麥克米倫（Macmillan）書局於一九七〇年所出版的「和平與安全之理論」（*Theories of Peace and Security*）一書中。

註③ 「艾德費論叢」在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有存，可惜不全。「生存」兩月刊，則自一九七〇年以後（即十二卷七期以下）全有。

戰略研究所不是以「量」取勝，但頁數薄薄的研究成果，也能搏得舉世的重視。

二、美國加州的蘭德公司

假如我們要說倫敦的戰略研究所是英國的首要戰略研究機構，則在美國而言，就非蘭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莫屬了。「蘭德」一詞，實係「研究與發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之英文的縮寫。該公司正式成立於一九四八年五月，但論其最先的起源，不能不談到所謂「蘭德方案」(Project Rand)，這是指美國空軍與道格拉斯飛機公司(Douglas Aircraft Company)合作從事研究的一個構想。我們知道，在二次大戰期間，有許多科學家(包括自然科學家及社會科學家)都對擊敗軸心集團作了很大的貢獻；當戰爭結束後，這批人才如不加以充分利用，殊為可惜。同時，在當時之美國各大學，雖有上等的教授，但他們對於戰略問題以及廣闊的國家安全問題，則由於受傳統環境的影響，並沒有深入的研究，這是一項學術上的大缺陷。所以在陸軍航空隊司令(空軍的前身)安諾德上將(Henry H. Arnold)的支持下，命令撥款一百萬美元，網羅專家，由空軍當局提供情報及研究資料，進行有關決策問題的研究。這就是「蘭德方案」的主要含義^④。

至一九四八年五月，「蘭德方案」結束，再由美國的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資助創辦費，正式成立了「蘭德公司」。當然，美國空軍還是繼續將計劃委託給蘭德公司研究的；一九五〇年間，美國的原子能委員會(Atomic Energy Commission)也開始對蘭德公司產生了興趣，予以不少協助。其他與蘭德公司發生關係的政府機構頗多，如國防部的高級方案研究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國家航空及太空總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國際開發總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以及國務院等等，都是其例證。在這些官方的大力支持下，蘭德公司是不愁其財源的^⑤。

可是吾人不要誤會，雖然蘭德公司與美國官方的研究關係很密切，但是在行政作業及法律地位上，蘭德公司是完全獨立的，它是一個非營利的民間機構。所有蘭德公司的研究工作，均係依照下列三原則而推行：(一)、研究人員有充分的評斷自由，縱使他的觀點與結論與政府人士相反，也要尊重研究者的成就，不可因政治原因而予以捨棄。(二)、蘭德公司鼓勵研究者發抒斬新的觀念

註④

「學術機構介紹：蘭德公司」，美國研究中問題通訊(紐約：中國新聞處)，第六期，民國六十三年二月，第二頁。

註⑤

關於國際開發總署等機構之性質及組織情形，請參看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Manual, 1978-79*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國際開發總署在四一七至四一三頁。

和不拘成規之分析方式，祇要能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可以迅速地出版，開放給學術界來批評。(二)、儘量採用「計量」的方式與「定性」之分析法；由於許多年間之不斷改進，此法現已普遍為大學和政府所接受。如「兵器系統分析」和「搏突戰略」(Strategy as a game)都是由蘭德公司帶頭提倡的。在以上三個原則的指導下，難怪蘭德公司的名聲遠播於世界六大洲了。據統計，在過去三十二年內，由蘭德公司交給出版商或大學印刷局刊行的專書，已將近二百種^⑥。另有一萬五千篇以上的論文和研究專論，在各處發表(包括蘭德公司本身的出版品以及其外的專技性雜誌)。在美國本土，有二百五十所以上的圖書館和公私機構成套地蒐集蘭德公司的出版品；其他如英國、法國、西德、義大利、荷蘭、丹麥、瑞典、瑞士、西班牙、澳大利亞、加拿大、巴西、印度、以色列、南非、日本、新加坡等國，也都曾進行對於蘭德公司出版品之收藏。遺憾地是，就作者所知，在臺灣沒有一個研究機構曾藏有相當完整之蘭德資料。

蘭德公司最先僅設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聖塔蒙尼加(Santa Monica)地方，後來由於業務有成就，才於美國首都成立辦事處，派一副總裁主持之。一九六八年元月，蘭德公司接受紐約市的請求，於該市成立蘭德研究所(The New York City-Rand Institute)，將科學方法用於解決市政問題上，由紐約市和蘭德公司本身共同選出董事會以主持之。迄至目前為止，蘭德公司總共擁有職員及研究人員在一千人以上，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組織；此外，還在美國全國各著名學院中，聘請數百位專家，擔任蘭德公司的顧問。

在內部研究部門之劃分上，蘭德公司分為經濟研究所、工程研究所、情報科學與數學研究所、管理研究所、物理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以及蘭德電腦中心、蘭德研究院(The Rand Graduate Institute)等等。其中電腦中心是在一九七一年三月擴大的，對於情報處理技術之研究貢獻甚大。蘭德研究院是在一九七〇年成立的，現設有政策分析的博士學位，對外招生，但在名額限制內，約有一半都是蘭德公司內部的人員，祇有另外一半才是完全開放的^⑦。由上所述，足見蘭德公司的成功不是偶然的，雖然也有若干人對該公司的研究成果表示懷疑態度^⑧，但毫無疑問的，我們若不說現代的核子戰略則已，如要談論到現代之核子戰略，則必須要提及蘭德公司。

註^⑥ 如坎恩(Herman Kahn)的《論熱核戰爭》(On Thermonuclear War)一書，交由普林斯頓大學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inceton University)於一九六〇年出版；謝林(Thomas C. Schelling)的《衝突戰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交由哈佛大學也於同年出版等，均是顯例。

註^⑦ 一九七〇年，蘭德研究院首度招收研究生十名，以後年有增加。主要修習課程為公共政策、國家安全事務以及社會科學方法應用等等。

註^⑧ 對於蘭德公司所發展之戰略觀念批評最力的，為Colin S. Gray, "What Rand Hath Wrought," *Foreign Policy*, No. 4, Fall 1971, pp. 111—129.

三、瑞典首都的國際和平研究所

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最初成立於一九六六年，它的原名是「國際和平與衝突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至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四日起，才改稱今名，簡稱爲「茜甫瑞」(SIPRI)。說到該所的建立，是頗有一段政治之啓示性故事的。

我們知道，在數百年前，瑞典是北歐的一個強國，它經常與外國從事戰爭，直到一八一四年拿破崙戰爭結束以後，瑞典國內才獲得常期的和平。從一八一四年至一九六四年這一百五十年間，瑞典總共換了七個王^⑥，但是瑞典始終維持了不間斷的和平，這在其他國家是非常少見的，瑞典人民亦以此而自傲。所以當時的瑞典首相艾蘭德 (Tage Erlander)，就在一九六四年八月發表了一個重要的演說，認爲瑞典應該成立一個研究和平的維持及衝突之防止的學術機構，以紀念瑞典一百五十年的長期和平。此一建議獲得了普遍的反應，於是瑞典國王任命了米達爾女士 (Mrs. Alva Myrdal) 爲皇家委員會 (Royal Commission) 的主席，專門研究此問題。一九六六年一月，皇家委員會提出報告，認爲瑞典在國際政治上具有獨特的地位，由於瑞典長期標榜中立政策，所以在態度上能够不偏不倚，這是從事研究和平及衝突問題的最優越的條件。所謂「旁觀者清」，在美俄兩國劇烈競爭之現今情勢下，莫斯科及華府的學者，很少是不帶了「有色眼鏡」來看問題的。於是很快地，瑞典的國際和平及衝突研究所就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宣告成立。

依照現行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組織規章」(Statutes of th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第二條之規定，該所的建立是以「基金」(Foundation) 爲基本費用之來源，其目的是要從事於「與國際和平及國際安全有重要性之問題」以及「試圖對國際衝突之和平解決條件加以瞭解並建立一個安穩的和平」諸問題，予以「科學性之研究」^⑦。若拿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經費來源，以與前述之蘭德公司相比較，則可顯見兩者之不同。蘭德公司的經費是來自多方面的，就單以基金會的協助論，即有福特基金會、洛克斐勒基金會、卡芮基金會等等。但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基金則全係由瑞典的國會以立法手續而撥出的。因而在基本上，瑞典的國際和平研究所無需向外再籌措財源，祇靠國會的撥款便已

註⑥ 這七個君主是查理第八 (Charles XIII, 1809-1818)、查理十四 (Charles XIV, 1818-1844)、奧斯卡一世 (Oscar I, 1844-1859)、查理十五 (Charles XV, 1859-1872)、奧斯卡第二 (Oscar II, 1872-1907)、古斯塔夫第五 (Gustavus V, 1907-1950) 以及古斯塔夫第六。

註⑦ 國際和平研究所組織規章全文，見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Report of Activities 1974*, pp. 12-15.

足夠。「科學評議委員會」(Scientific Council)是瑞典國際和平研究所之最重要的組織，由二十四位委員組成，不限國籍，瑞典以外的人士亦可擔任。像美國的包汀教授(Kenneth Boulding)、蘇聯的杜京教授(Grigori Tunkin)、法國的捷瓦耐教授(Bertrand de Jouvenel)、義大利的薩拉姆教授(Abdus Salam)、西德的威茲塞克教授(Carl Von Weizsäcker)、以色列的基南教授(Alex Keynan)、挪威的格爾騰教授(Johan Galtung)等等，都曾為或是現任的評議委員。

吾人在前面已說過，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之出版品，不以頁數衆多見稱，但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正是相反。所有該所出版的重要書籍，莫不以大部頭問世，最少亦在四百頁以上。如「世界軍備及裁軍年鑑」(SIPRI Yearbook of World Armaments and Disarmament)一九六九年者為四百四十頁、一九七〇年者為五百四十頁、一九七二年者有六百頁、一九七四年者有五百二十頁，即為明證。該所在一九七一年曾出有「與第三世界之武器交易」(The Arms Trade With the Third World)一書，厚達九百一十頁，內容異常豐富，例如中共之對外軍援概況，即很容易從這本書中查到。

在專題研究小冊子(多未超過一百頁)方面，亦出了數十種之多，大部份都是有關核子武器和戰略科技之分析的。諸如一九六九年出版「通訊衛星之研究」(Communication Satellites)、一九七〇年出版「利用震波法以監視地下核子試爆論」(Seismic Methods for Monitoring Underground Explosions)以及一九七二年出版之「汽油膠化劑與燃燒武器」(Napalm and Incendiary Weapons)等等，均屬深入性之研究，足可供分析戰略問題之參考。從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已經出版的各種研究著作看來，可知它的研究重點是在國際裁軍(包括限武談判)、戰略科技以及開發中國家武器裝備之發展等此三方面的。

四、喬治城大學之戰略研究中心

喬治城大學是一所具有相當悠久歷史的學府，它的戰略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簡稱CSIS)與美國國會關係相當密切。目前的研究分四大部門，每一部門都有一位執行主任(Executive director)，以負其全責。第一部門是注重於「世界權力研究」的，由克萊恩(Ray S. Cline)擔任執行主任；第二部門是「資源研究」，即包括對於能源、糧食和與商務有關之研究，由小約旦(Amos A. Jordan, Jr.)擔任執行主任。第三部門是「第三世界問題研究」，特別注重於非洲及太平洋沿岸之第三世界國家，由薩繆斯(Michael A. Samuels)擔任執行主任。第四個部門是「世界的一般問題研究」，這包括國際間的人權政策、社會政策以及洲際通訊等等，由科特瑞(Alvin J. Cottrell)擔任執行主任^②。

^② Brian Crozier (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s in the Field of Conflict Studies* (Londo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 1979), p. 5.

喬治城大學戰略研究中心之出版品頗多，可歸納為五大類。第一類為季刊，因喬治城大學位於華府附近，故就取名為「華府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內容為戰略性及國際關係之評論文章，現由該戰略研究中心主席艾伯希爾 (David M. Abshire) 和拉魁爾教授 (Prof. Walter Laqueur) 兩人共同擔任主編。第二類係有關公共政策問題 (Public Policy Issues) 的一般性作品，它的總稱叫「華府論叢」(The Washington Papers)，每年出版十本，每本各具獨立性，在百頁以下，迄今已出版七十餘冊，就作者而論，寫作最多的是魯瓦克教授 (Edward N. Luttwak)，如「華府論叢」之第三號為「一九七二年之戰略平衡」(The Strategic Balance, 1972)，第十三號為「美俄間之核武平衡」(The U. S. - U. S. S. R. Nuclear Weapons Balance)，第三十八號為「戰略力量：軍事能力與政治效用」(Strategic Power: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Political Utility) 等，都是魯氏所寫作的。另外，「華府論叢」第六十一號題名為「地中海之海權」(Sea Power in the Mediterranean)，是魯瓦克與魏蘭 (R. G. Weinland) 兩人所合著的。

喬大戰略研究中心之第三類出版品為專門性討論會的報告 (CSIS special panel reports)。該戰略研究中心每年均舉行所謂「四邊關係會議」(Quadrangular Conference)，即由西歐、美國、日本，再加上加拿大所舉行之國際性會議。其出還有各種的國會幹部研討會 (series of seminars for Congressional staff) 以及資深聯邦官員研討會 (series of seminars for Senior Federal officials) 和華盛頓法人代表研討會 (seminars for Washington corporate representatives) 等等。多數討論會的報告在資料上甚具參考價值。

第三類喬大戰略研究中心之出版品，是屬於「研究專刊」(CSIS monographs)，這種專刊出版期間不定，大約每年總在二十種左右。如當中美斷交後，喬大戰略研究中心為了要瞭解卡特此種決定之影響及在國際政治中之涵義。乃由道南恩 (Robert L. Downen) 進行研究，結果發表了名為「在中國搏奕中之臺灣棋卒」(The Taiwan Pawn in the China Game) 一本專刊，受到各界相當的重視，就是一例。喬大戰略研究中心出版品之最後一類，即第五類，乃是屬於「基要研究以及資料性之參考作品」者 (Major studies and reference works)，其最受重視之著作，係由克萊恩所寫的「世界國力評估」一書 (World Power Assessment)。這本書在基本上是屬於資料性質的，每兩年即改寫一次，以便能與國際政治現實作密切的結合。「世界國力評估」，初版於一九七五年，再版於一九七七年；照理說，第三版應於去年 (一九七九年) 出版，但是克氏未出。直到今年 (一九八〇年) 才出第二次的改寫版，他將書名更改為「世界權力趨勢與一九八〇年代之美國外交政策」(World Power Trend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80s)。由於克萊恩不認為「和解」政策可以解決世界問題，所以蘇聯的真理報 (Pravda) 曾對克氏大肆攻擊。也正因如此，克萊恩在俄國也為人所知曉了^②。

註② 克萊恩在「世界權力趨勢與一九八〇年代之美國外交政策」一書中，將中華民國之國力評估為世界之第十二位，此係依據一九七八年時之資料而計算者。

五、英國的衝突研究所

英國的衝突研究所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設於倫敦的金廣場 (Golden Square) 附近，現任主任爲克羅錫爾 (Brian Crozier)。該所成立於一九七〇年，到現在才只有十年的歷史。然而它却有一大特徵，即該所擁有一個相當完備的圖書館，裏面存有全世界最多的有關極端主義者運動 (extremist movements) 之基本資料，故衝突研究所對於所謂「國際恐怖主義」(international terrorism) 確有深入的研究。這包括國際綁架、勒索、擄票、暗殺、爆破、劫機等等。

吾人更由該所評議會的重要組成人員，可以瞭解到，衝突研究所之研究工作，對共黨問題之解析亦甚看重。如麥克斯·貝羅夫教授 (Prof. Max Beloff)，希頓瓦遜教授 (Prof. G. H. N. Seton-Watson) 以及勞勃·湯普遜爵士 (Sir Robert Thompson) 等，都是其成員之一。前兩者的成就，主要是在蘇聯政治及國際關係方面，貝羅夫的名著爲「一九四三年至一九五一年間蘇俄在遠東的政策」(Soviet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43-1951)，於一九五三年由英國牛津大學出版。希頓瓦遜教授之名著爲「從列寧到馬林可夫：世界共產主義發展史」(From Lenin to Malenkov: The History of World Communism)，我國邵國律先生曾將此書譯成中文出版。湯普遜爵士對於共黨的戰爭及戰術甚有研究，一九六一年以前，他在馬來亞對抗共黨游擊戰獲得完全的成功。從一九六一至六五年，他以英國顧問團 (British Advisory Mission) 首腦之身份，被派至越南。湯氏之主要著作爲「論擊潰共黨叛亂」(Defeating Communist Insurgency)，「勿從越南退出」(No Exit from Vietnam) 以及「和平不在手邊」(Peace is not at Hand) 等^⑩。由於以上諸人之成爲衝突研究所的重要支持者，當然使得該所之國際地位爲之昇高。衝突研究所最重要的定期出版刊物，乃是每月一期之「衝突研究」(Conflict Studies) 月刊。該刊與衆不同之處，爲每期均係專題研究之報告，題目只有一個，且僅由一人執筆。迄至目前，已出至一百一十餘期。衝突研究所主任克羅錫爾個人執筆者，卽有八種之多，其中重要者，如第七期爲「論衝突之研究」(The Study of Conflict)，第三十期爲「蘇俄在加勒比海之壓力」(Soviet Pressures in the Caribbean)，第七十六期爲「安全與所謂和平之神話」(Security and the Myth of "Peace")，第九十二期爲「蘇聯的代理性武力」(The Surrogate Forces of the Soviet Union) 等等均是。其他如該所資深研究員瑞斯

註^⑩ 其他身任該所評議委員會者，有夏波瑞 (Leonard Schapiro)，係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教授，范納 (S. E. Finer) 係牛津大學政府學及公共行政教授，馬丁 (L. W. Martin) 係前任國王學院 (King's College) 戰爭研究教授 (Professor of War Studies) 等等。

David Rees)、維京生 (Paul Wilkinson) 以及曼諾爾 (S. W. B. Menaul)、亦常有著作發表^②。

此外衝突研究所尚有每年一冊之「力量與衝突年鑑」(Annual of Power and Conflict)、此係資料性之彙編，包括全世界各國之重要革命運動以及「革命以外的諸種對安全之挑戰」(non-revolutionary challenges to security)^③。綜言之，衝突研究所之工作重點，乃是欲由國際不穩定 (world instability) 之現象面，探求其所以不穩定之原因，而提出建立國際穩定生活之方策。它雖以「衝突研究」為號召，但却與馬克斯之強調衝突生活，大相徑庭。

六、結 論

由以上對於戰略研究機構之介紹中，我們可以發現在當前的戰略分析上，所涉及的範圍實在太廣，沒有任何一個機構能够全部包羅萬象的；因之，每個研究機構，欲有成就，必須要有重點。如蘭德公司以研究核戰理論而有名，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所以研究軍事平衡而著稱，斯德哥爾摩的國際和平研究所則以分析國際裁軍而有重大貢獻，喬治城大學之戰略研究中心以總體分析法來評估世界國力之游動，即所謂「戰略游動理論」(Strategic Drifting Theory)，而名噪一時；即英國的衝突研究所，顧名思義，亦以分析國際不穩定現象而引起重視。這都是些顯例。

研究戰略，亦和其他學術研究一樣，需要彼此間的互切互磋，最忌「閉門造車」。倫敦戰略研究所和斯德哥爾摩之國際和平研究所之所以能贏得各國之重視，因素固然甚多，但和它們的「國際性」顯然有重要關係。可惜在亞洲所有的各戰略研究機構中，似尚沒有一個在國際地位及聲望上，能和本文所提及之各戰略研究機構並駕齊驅者，這還有待於我們東方人作更大的努力。

戰略研究，是一種科學性之研究；科學以「實證」(empirical) 為核心，故凡帶有強烈意識型態之戰略研究，皆屬主觀之戰略研究，與科學所要求的基素背道而馳。所以西方著名的戰略研究機構皆存在於自由民主的國家，沒有一個是在共黨統治下的。這一點，更應值得吾人加以重視。戰略作為一種學術來研究，必須先要有「開放的心靈」！

註① 瑞斯的著作為「蘇俄對非洲的戰略滲透」(Soviet Strategic Penetration of Africa)和「美國情報之危機」(The Crisis in 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維京生的著作為「恐怖主義與自由派之民主：論反應之問題」(Terrorism Versus Liberal Democracy: The Problems of Response)和「從國際角度論恐怖主義」(Terrorism: International Dimension)；曼諾爾的著作為「日本的防衛政策」(Japan's Defense Policy)和「美俄間武談判第一階段論：歐洲之不平衡」(SALT II: The Eurostrategic Imbalance)。

註② Brian Crozier (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s in the Field of Conflict Studies*, P. 21.